



内部资料

国际经济观察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bservation

简报系列

(Briefing)

G20 杭州峰会与 中国发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网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工商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6年7月

《国际经济观察》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彭 龙 丁 士 张国有

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列）

蔡连侨 蔡芝芳 车 琳 崔 军 戴桂菊 丁红卫 金利民

柯 静 李莉文 李雪涛 李迎菊 李永辉 刘 建 邵建国

史铁强 孙晓萌 陶家俊 万 猛 王建斌 王立弟 王旭东

魏崇新 文秋芳 徐一平 薛庆国 姚晓舟 赵 刚 张 剑

张妮妮 张西平 张晓东 张朝意 章晓英

主编：牛华勇 孙文莉 任康钰

副主编：刘 鹏 马 琳 裴艳丽 钱小沧 邵明星 宋泽宁 吴 浩 詹惠蓉

执行编辑：左 洁 胡慧璟 徐小凤 杨 潇

《国际经济观察》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邮编：100089

电话：010-8881 7751

传真：010-8881 0062

邮箱：g20@bfsu.edu.cn

zuojie@bfsu.edu.cn

网站：g20.bfsu.edu.cn

公众微信号



【编者按】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第十一次领导人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脆弱、不均衡，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在结构调整中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此次 G20 杭州峰会？又该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在全球化新的进程中具有的竞争优势和发展路径呢？这期简报，我们将通过张志洲和陈岳云两位老师的文章，和您一起更加深入地理解 G20 杭州峰会和中国发展。

杭州 G20 峰会的三重涵义

张志洲

2016年9月4日至5日，杭州将举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深受国内国际舆论关注。其实，中国作为 G20 的重要成员，已经不止一次举办过 G20 的会议，如早在 2005 年 10 月，北京（实际会议地点在河北香河）就已举办过一次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而 2016 年中国是 G20 主席国，已于 2 月 26-27 日在上海举办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然而，自 2008 年 11 月举办首届 G20 首脑峰会以来，今年是 G20 峰会首次由一个中国的城市来承办，它赋予了杭州 G20 峰会许多重要的涵义。在 G8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G20 反映了国际治理机制的变迁，中国在 G20 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反映了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增强，在杭州举办 G20 是近年来中国主场外交的新版本，这是杭州 G20 峰会最重要的三重涵义。

一、G20 反映了国际治理机制的重大变迁

“国际治理”、“世界治理”与“全球治理”这几个不同的名称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在没有出现“全球治理”概念之前，国际治理是民族国家体系产生之后一直存在的治理方式，国际治理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就是世界治理。到了全球化时代，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支柱，也可以说，国际治理与世界治理、全球治理几乎相等同了。

二战之后，国际治理或世界治理、全球治理发生了几次大的变迁。早在二战后期，当时美、苏、英、中等主要国家的领导就对未来的世界治理或国际治理有个蓝图，包括建立联合国、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的全球化、五大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等内容。但不幸的是，随着冷战到来，原来在美、苏设想基础上的战后世界，很快演变成事实上的冷战世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

阵营对抗，使一个统一的世界成了一个分裂的世界，美、苏各自“治理”一个阵营。这个时期一个分裂的世界之所以没有走向一个毁灭的世界，主要是国际社会的权力制衡以及核武器对于战争观念的影响所致，但难以说存在“世界治理”。

中国原本“一边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而后中苏分裂一方面表明中国是一个“反体制”国家，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比重，由话语权之争走向了现实中的中苏分裂。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出于经济治理和政治外交协调的需要，于1975年成立了七国集团(G7)，是其国际治理的重要表现。冷战终结后，西方七大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调整，国际治理有了新发展，G7在吸纳俄罗斯后演变成G8。从这些历史演进来看，在过去的国际治理或世界治理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扮演主角，甚至是被治理的主要对象。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国际治理变化是，G7或G8并没有能够承担起全球化时代到来后错综复杂的全球治理任务。同时，世界发展出现新的态势，特别是作为国家实力支柱的经济力量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结构变化，如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崛起，金砖国家形成团体。原来的七大国或八大国对全球事务、特别是经济发展事务的治理能力下降，只有让一些区域性大国参与进国际治理或全球治理，使它们拥有更大的治理话语权，在这个相互依赖日深的世界才是合理的。于是，1999年在原来G8的基础上成立了G20，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中国作为G20成员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此后又历经近10年，全球性治理危机进一步凸显，特别是2008年始自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原来主要的几大世界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的治理乏力，深化协调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治理需求，终于催生了G20首脑峰会。G20各成员都是各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拥有更大的全球治理责任。

可见，G20的产生、尤其是G20峰会机制的产生，反映了国际治理机制的重大变迁，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具有更广泛代表性、更高效率、更高权威的机制化需要。中国因为崛起和区域代表性而成为G20成员，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性国家，崛起的力量与对大国责任的承担相辅相成。从这个角度来认识G20峰会的国际治理价值，才能更好地看到中国举办G20峰会的意义。

二、G20与中国的国际制度话语权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将权力与利益作为核心概念，并提出了“由权力界定利益”的经典命题。不过，现实主义对于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假设只有在“主权国家之上无更高权威”这一点才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现实的国际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在现实主义遇到挑战的地方产生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主义。国际

制度有许多种类，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官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和私人性质的国际组织）是国际制度的重要形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参与的国际组织少，对国际制度参与不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而且也主导了一些国际组织的成立，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集团、亚投行等等。事实上，对于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重要指标。国际制度话语权又是一个国家在总体上拥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外交能力密切相关。崛起的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包括强大的国际制度话语权；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就不可能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国际制度话语权虽然不仅仅是指参与和主导国际组织的建设，还包括更丰富的内容，有形的组织之外也还有无形的制度，但是国际组织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由此可见，通过参与国际组织甚至主导创建国际组织对于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意义。

数十年来，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但由于基本上作为后来者接受既有的制度规则而“加入”的，中国大致扮演着“追随者”角色，所以国际制度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显然，崛起中的中国继续仅仅扮演追随者角色是“人民不答应的”，一方面自身有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期许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参与更多国际组织建设。G20就是世纪之交新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G20峰会更是中国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重要载体。作为国际制度的一种，G20通过协商、合作、共赢、共克时艰的精神，与其他许许多多的国际组织一样，对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秩序化努力。与过去中国只能作为追随者的无数国际组织不同，中国是G20的创始成员，一开始就参与了制度的建设，这为中国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提供了一大平台，更是首先为中国提升在本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打开了通道。虽然G20有20个成员，但是毕竟能力更强的成员对制度建设的贡献可以越大，因而所获得的国际话语权也可以更大。另外，中国要通过国际制度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掌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一般规则，如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设置、引导议题讨论；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繁荣的道义制高点，来阐明解决全球共同问题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方案；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制度建设的视角下创新与传播新的概念、知识、价值等等。对照这些因素，中国提升自己在G20中的国际制度话语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杭州G20峰会则是中国提升在G20中国际制度话语权的一次机遇。

三、中国主场外交的新版本

主场外交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外交中主导性身份和地位的一种体现。近年来

中国的主场外交非常活跃,承揽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或具有外交影响力的体育活动、文化活动。这些主场外交一方面体现了开放的中国形象和增强的中国国际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外交中日益增强的“主场意识”。近年来中国举办的主要主场外交包括了2014年由北京承办的APEC首脑峰会、2015年上海承办的亚信会议,也可算上2001年开始的博鳌亚洲论坛,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深圳大运会等等。从主场外交的视角来看,这次杭州G20峰会恰是中国主场外交的一个新版本。

杭州作为主场场地具有其特别的优势,包括地理优势、人文优势、经济优势、科技优势和政治优势。在地理位置上,杭州靠近上海,是东南沿海和长三角地区的最重要城市之一,且是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的省会城市,某些时候也是上海功能的延续,比如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谈判《上海公报》之际,就去了杭州。美丽的西湖更是杭州人文地理的名片,享誉世界。宋文豪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写杭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同样享誉世界的,还有举世无双的钱塘潮景观。从人文角度说,作为南宋古都,杭州代表着中国历史上人文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南宋词人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就形容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次G20举办的时间,也正是农历八月之初的秋天,杭州必将更好地展现其美丽风光。当今杭州的经济优势不仅体现于它是浙江的经济领头羊角色,是浙江经济的枢纽,还在于其经济总量超过南京而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仅次于上海的省会地位。杭州的经济近年发展与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杭州的科技优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互联网科技。杭州也是互联网新经济“大佬”马云的老家,是阿里巴巴的基地。这些优势目前其他省会城市难以企及的。杭州的政治优势,在于它是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多年主政浙江的所在地,在这里,他写出了《之江新语》系列文章,杭州与浙江的发展成就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一些重要治国理政思想。杭州可以展现一个古老而现代、富有人文韵味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诸方面富有活力的城市形象,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具有代表性。概言之,作为这次G20峰会的主场,杭州因自身的各种优势而引人注目。

以上所阐述的三重涵义,是我们认识杭州G20峰会意义的重要方面。也可以说,从以上不同的分析视角,我们能看到杭州G20峰会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当然,

峰会的举办是一个整体事件，是以上三重涵义的交互融合。此外，必须指出，会议主题是会议的核心，杭州 G20 峰会的主题尽管不是由中国单方面决定的，但据称这次会议将会为世界经济发展描绘新的蓝图。它对于 G20 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将取决于它在各经济体之间的协调能力以及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蓝图的现实可行性。

全球化, 中国发展与竞争优势

陈岳云^①

一、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地位

人口方面：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 18.9%，美国占 4.4%，日本占 1.8%，德国占 1.1%，印度占 17.8%，韩国是 0.7%。

GDP 方面：从人均 GDP 看，中国接近 8000 美元，美国约为 53000 美元，日本接近 38000 美元，德国为 46000 美元，韩国接近 26000 美元，印度低于中国，人均 GDP 不到 1500 美元。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在 2009 年超过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中国已经加入 GDP 十亿美元的俱乐部，而日本经济总量在过去二十年几乎没有增长。

贸易方面：中国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13%。中国以世界 18% 的人口，创造了 12.5% 的 GDP 和 13% 的贸易额。我们虽然是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份额并不占优。相比之下，美国以世界 4% 的人口，创造了世界 22% 的 GDP 和近 13% 的贸易量。印度有许多指标落后于中国，目前印度出生率较高，总人口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超过中国，但人均 GDP 不足 1500 美元，要在这方面赶超中国恐怕还很遥远，贸易总量也并不突出。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有许多方面值得骄傲，但人均指标依然不高，即使在贸易方面也是如此。

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3 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接近 2600 亿美元。而美国是贸易赤字国，有接近 7000 美元的贸易赤字。日本虽然一直是贸易大国，但近年实际也是贸易赤字；德国以贸易立国，有很大数量的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大概是中国 GDP 总量的 4%-5%，而德国的贸易顺差则占到了其经济总量的 25% 左右，是一个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国家，依靠的是其强大的制造业。印度的货物进口量仍是比较大，服务贸易的出口量也很

^①陈岳云，美国洛杉矶西来大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北外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的讲座整理修改而成，国商研究生何远林同学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可观。

表 1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人口、土地、水、GDP 和贸易 (2013)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韩国
总人口	1,357,380,000	316,497,531	127,338,621	80,645,605	1,279,498,874	50,219,669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18.92%	4.41%	1.77%	1.12%	17.83%	0.7%
GDP 总量 (美元)	9,490,602,600,148	16,768,053,000,000	4,919,563,108,372	3,730,260,571,357	1,861,801,615,478	1,305,604,961,393
人均 GDP (美元)	6,991.85	52,980.04	38,633.71	46,254.98	1,455.10	25,997.88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	12.47%	22.03%	6.46%	4.90%	1.72%	2.45%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9,388,211	9,147,420	364,560	348,540	2,973,190	97,466
总耕地面积 (公顷)	105,720,000	151,837,000	4,237,000	11,876,000	157,000,000	1,495,800
人均可耕地面积	.08	.48	.03	.15	.12	.03
淡水总量 (亿立方米)	554.10	478.40	90.04	32.30	761.00	25.47
贸易总量 (百万美元)	4,693,141	5,002,218	1,855,906	3,244,603	1,054,824	1,292,923
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例	12%	13%	5%	8%	3%	3%
贸易/GDP	43.91%	30.13%	35.14%	85.32%	53.28%	102.77%

经济结构方面：农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 9%，工业占 40.5%，服务业占 50.5%；美国农业只占经济总量的 1%左右，服务业占到了接近 80%；日本的服务业占 70%左右，工业的比重和德国类似在 28%至 30%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是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自然趋势，在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就目前看来，农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还是较大。近年来，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主要压缩的是工业的份额，这也是近年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景气的一个结果。从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来看，根据官方统计，有 40%的就业岗位在农业，而工业和服务业各提供了 30%左右的就业岗位。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一就业结构显然并不合理，我们 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 9%的产值，也有学者认为 40%的就业岗位涵盖了乡镇企业等工作，即使这样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

力的百分之二十多也是很高。相比之下，印度的就业结构就更不合理，50%左右的劳动力创造了百分之二十多的财富。

具体来看，中国的第三产业和高收入国家差距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职业服务（professional services），比如咨询、会计、律师等行业还不够发达；其次，社会服务比较落后，比如养老产业。这当然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文化也有关系，目前我国已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占总人口 16%左右，人口结构老化虽然不及日本老年人比例高达 25%。人口老龄化也是过去二十年日本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劳动参与率下降，我国社会劳动参与率最高时达到 76%，现在则不到 70%，社会中必然是有一部分人口是无法从事劳动，比如老人和小孩。这是我国政府现在开放二胎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发展需要要素的投入，其中就包括劳动力。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家庭需要照顾四位老人，如果全靠家庭养老，年轻人如何工作？所以，这需要国家的投入、社会的投入，美国每年联邦政府的预算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投入到社会福利，欧债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社会福利负担太重，超过了政府预算的 60%。中国目前有 2.2 亿老年人，但社会福利的开支在中央政府预算中还不到 20%。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生产水平只在世界平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力需要提高农业的科技投入和农产品的深加工水平。

城镇化方面：2014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 54.7%，现在是 55.6%，每年增长率为 1%左右。美国的城市化率在 83%左右，日本在 91%以上，德国为 74%，印度比中国低一些。我国现有 13 亿多人口，中国城镇化水平每年 1%左右的增速意味着每年有一千多万人从农村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也意味着政府需要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目前还有许多人无法真正在城市安居，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根据官方统计，如果按居住证和户籍口径估算的话，中国的城镇化率只在 39.5%，以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好城乡一体化的问题，要解决好市民的医疗、教育、就业等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政府债务方面：2014 年中国中央债务占 GDP 的 17.1%，财政赤字在 2.3%左右，2016 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到 GDP 的 3%。美国联邦政府 2014 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 6.5%，今年稍低一些在 3%左右，日本较高，而德国较低。今年，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包括就业、增速放缓等问题，但是中央政府手中还是有很多“牌”可打的。一是巨额的外汇储备，3 万亿多美元，必要时可以保障银行的债务；二是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还不高，未来刺激经济和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的过程中产生的失业等问题的救济，可以通过财政负担一些。

国民教育程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约培养了两亿大学毕业生，大学教育率在 11%左右，加上文革前培养的和海外受教育的，个人估计大学教育率在

15%左右，这与过去相比进步很大。1977 年的高考本科录取率是 1%，今天北京高考本科录取率可以达到 70%，全国水平可以达到 60%左右。但是在我国总人口中，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凭的比率相对还是较低，美国大学教育率达到 35%。由此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未来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质量上还有待提升。美国有四年制大学本科教育的高校约有 1500 所，中国现有 1400 所左右，如果加上各种大学民办的独立学院，我们在数量上几乎可以超过美国，许多民办大学未来还可能面临招生困难、生源不足的问题。

研发和科技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科研投入占 GDP 的 2.01%，美国为 2.8%，我国科研投入水平比印度高不少，但与日本、德国相比差距还是不小。从投入总量的绝对数来讲，我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14 年以来，我国成为了年专利申请数量的第一大国，但我国的专利利用率依然很低，一般认为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一些。可见，我国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产业化应用程度还是不高，这不只是科研水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科研体制的问题。近年来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科研体制改革的措施，因为科研创新、科技成果的成果转化应用不仅需要单纯投入，还需要制度性的激励与保护。

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过去几十年间，总的来讲是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贸易量几乎每十年翻一番，也就是说每年有 7%左右的增长率。2015 年中国的贸易下降了 6%，低于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增长 8%的目标，今年 1 月我国外贸下降了 11.2%，2 月下降 25.4%，3 月份增长了 11.8%，出现了回暖势头，同期美国贸易也有所下降。目前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不小，倚重外贸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许多企业形势依然不乐观。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依然低于发达国家，但趋势上两者的份额越发接近，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是贸易的受益者，当然也造成了一些环境破坏，发达国家同时也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受益。具体来看，美国的进口大大多于出口，所以造成了很大的贸易赤字。中国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贸易发展很快。国际投资方面，虽然有起有落，有时会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总体还是上升趋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的外国投资不断增加，这和中国经济发展上升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我国的对外投资尽管也会受到国际经济大气候的影响，但总势头尤其是最近几年都是在不断上升。具体来看，中国海外投资的目的国，首选是美国。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组织，一方面，WTO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去年十月，美国倡导的 TPP 协议签定，TTIP 也在推进，中国也在倡导 10+6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WTO 成员国几乎涵盖了世界所有的人口、经济体、和贸易量，未来的贸易协议能在其框架下达成当然很好，但正

是因为 WTO 成员众多，想要取得新的突破和共识也很困难。所以一些国家开始绕开 WTO 签订 TPP 这样的区域性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

目前，TPP 的 12 个成员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36.5%，贸易比重为 38.2%，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1.2%，但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只占 28%，成员国仅和中国一国的贸易占 20%。因此，将中国排除在外，协议一旦生效，成员国之间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受损的却是与中国这样的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欧盟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 56.5%，中国倡导的 RECP 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33.3%。目前，TTIP 已经举行了 13 次会谈，如果成功的话，覆盖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总量都能达到 70% 左右，覆盖 18% 以上的人口，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当然，目前欧盟内部就 TTIP 还有比较大的分歧。尽管如此，TTIP 一旦达成对未来中国贸易出口的影响是很大的。

人员交往方面：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消费居世界首位，达 1650 多亿美元，人均平均消费也是世界第一。海外留学领域，美国境内现有 120 万外国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接近 30%，约 35 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是位居第二的印度的两倍。

二、全球化

全球化的影响是双面的，它对一些国家的就业，尤其是制造业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全球化对美国的机床制造、汽车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制造业岗位都带来了冲击，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强调制造业岗位的回流，但目前收效不大。跨国贸易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有三分之二的贸易都是通过它们完成的，中国的出口额中有 35% 是由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完成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各占百分之三十多。美国有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的收入来自于国际业务，比如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 AIG，它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市场。

全球化包括哪些方面？未来要实现怎样的全球化才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

第一，产品/服务市场全球化。加入 WTO 以来，中国很好地利用了市场全球化的机会，贸易出口额不断提高，但利用水平不高，主要依靠劳动力和成本优势，很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未来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就可能失去市场。

第二，生产、分销全球化。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学习。以 iPhone 为例，一部手机价格在七百美元左右，在中国制造，但中国企业从中加工一部手机中赚到的不过三四十美元，其原因在于所有的设计和高科技部件基本都是由美国、日本、韩国完成，中国主要负责的是加工装配。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实现了生产、分销的全球化，哪里成本低，质量可靠，就流向哪里。未来实现生产、分销的国际化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三，自然资源全球化。日本、以色列自然资源匮乏，却又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很高的经济活力，俄罗斯和一些中东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却经济结构单一，形成了对资源的严重依赖。我国东北也是如此，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却在经济活力上反而逊于依靠外贸加工起家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第四，人力资源全球化。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全球化，中国直到最近才出现了第一位自然科学方面获诺贝尔奖的学者。多年来，美国科学家几乎包揽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诺贝尔奖，有时甚至是包揽，但是其实大多数获奖者既不是美国出生，甚至都不是在美国接受的大学教育。中国要强大，需要的就是建立这样能吸引和培养全世界人才的制度。

第五，金融市场全球化。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企业、政府进行国际融资，但更重要的是上海、深圳这样的金融中心能吸引外国企业和机构到中国融资，为世界提供金融服务。

第六，文化全球化。这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领域，美国的经验证明了光有飞机大炮是不够的，软实力同样重要。尤其是最近几十年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经历更是让美国更加重视软实力，而软实力中第一位的就是文化。很多年前很少有人会想到去韩国旅游，如今去韩国旅游的年轻人可以说成千上万，很多人就是受到了韩剧、音乐等韩国文化元素的影响而喜欢这个国家，并去旅行，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更应该打好这张牌。

第七，制度全球化。它是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加入 WTO 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制度上要与世界接轨，之后很多规章制度都在不断改革，包括上海自贸区及未来几个自贸区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负面清单等都是为了接轨世界先进潮流。

第八，语言全球化。历史上随着各大国实力的消长，世界上人们广泛使用和主动学习的语言也在变化更替。从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到英语。建国之初的时候，我国学生还大量学习俄语，未来中文如果能成为世界性的语言，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强国梦算是实现了。

三、竞争优势

今天，创业是个很热的概念。创业要成功需要有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需要有四个组成部分：价值主张、资源、过程和利润公式。首先要能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客户；其次是要能掌握资源，包括人脉、技术、设施，老板们热衷于上商学院的 MBA、EMBA 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扩展人脉；再次是过程，能够通力合作解决各种问题；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有清晰的盈利点。

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怎样才能成功？本人认为坚持很重要，但是机遇同样

重要。阿里巴巴集团走到今天靠的是坚持，但是阿里巴巴发展美国 11Main.com 项目的失败却是因为机遇不对，没有了天时地利。

具体地说，成功其实是竞争力的体现，我们要找竞争优势，离不开合理地设计实施策略。本人设计了一个关于竞争策略形成的模型，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是一大要素。我们国有企业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国家体制的庇护而缺乏竞争的压力和努力的动力。以色列在短短几十年间从无到有，再到走向兴旺，如今军事、教育、经济、科研实力都很突出，可见资源匮乏，强敌环伺的压力也是动力。与此同时，远见是另一大关键，然后是竞争战略，这就构成了一个平衡稳定的三维模型（动力及压力、远见和竞争战略）。这是对哈佛商学院一位著名教授的环境和实力二维模型的发展。这个模型是以目标为导向，将长期目标（长短期目标的平衡）、自身能力（优势和劣势）、环境（机会与威胁）加入到模型之中。第二个模型是合适定位——波特模型。柯达公司的失败是由于替代产品的出现，在数码相机、拍照手机的冲击下一败涂地；诺基亚的失败是因为低估了智能手机的潜力。企业一定要认清竞争对手，找准自身定位。我们中国的企业很容易犯一拥而上的毛病，最后过度竞争、产能过剩。创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们的产品是否容易被复制模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清市场中的五种竞争力量：现有竞争者、新加入者、替换产品、客户和供应商。一般认为，竞争策略有三种：一是低成本，比如沃尔玛、小米手机；二是差异化，比如奢侈品牌，宝马、路易威登，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三是专项集中，比如夏天天气很热，我们选择去街角的 711 去买一个冰淇淋，而不是为了便宜几毛钱到偌大的沃尔玛里找半小时，优势就在集中高效。美国西南航空认为航空服务就是把顾客从 A 送到 B，所以它不提供无偿餐饮服务也不可以选座，胜在成本低廉、集中高效。

成功更需要执行力。一位美国大公司的 CEO 曾说，我们顶级的大公司有的是常青藤名优生和 MBA 毕业生，制定一个战略对于他们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如何执行。企业难得不是规划，难在执行。在企业制定竞争战略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所处环境的特征，不要受传统思维的束缚。有的行业，要做大才有优势（经典型战略）；有的行业变化很快，要快速适应（适应型战略）；有的行业要求成为平台与生态中的指挥家（塑造型战略）；有的行业要有超前思维（愿景型战略），比如苹果公司就提前抓住了消费者的潜在消费需求；有的企业遇到困难则要采取一些非常时期的战略和手段（重塑型战略）。

竞争中的优势又分几种：适应优势，及时地适应当地的环境；信号/信息优势，要及时把握信息的变化、政策变化；社会优势；系统优势；人的优势；模拟优势。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强项，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是创新能力。

中国还是要大力发展高端进口替代型的制造产业，进口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0%，其中67%是工业制成品。假设我们能减少5%的进口，就能多创造1%的GDP，这就是15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制造业的产值每提高1%，就能拉动0.2%的服务业。从工资水平上看，平均来说制造业的工资比服务业高15%-20%。这是因为除了高端服务业，其他服务行业的工资并不高，所以对于就业起点比较高的大学生、研究生而言，只有制造业发展了才能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那如何提高我们的制造业水平？发展高端进口替代型的制造产业是最直接有效的。本人曾访问的大多数企业使用的机床和高端生产设备都是进口的，但据我所知，大部分这样的设备，我们国内的企业都是有能力制造的。可是我们国内的大型企业对此并无兴趣，原因在于单笔订单数量太小，这就需要我们政策去激励引导。我国现在的专利利用率只有2%到3%，如果能把更多的投入放在帮助国内制造业发展升级上，一定大有可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竞争优势就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来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还依赖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投入。从字面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好像涵盖了所有要素，实际上它代表的是经济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加无法解释的部分。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科技的重要性，但如今我们产能过剩实际上是资本浪费的体现。我们要坚持提高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资本的机会成本。国家的竞争力，起源于国家的资源禀赋、制度和文化的。

我们的企业喜欢在红海中厮杀，尤其是外贸出口企业大打价格战，最后恶性竞争，无利可图。我们要向蓝海进军，要打出特色，要创新，要善于创造发现新的需求。

企业的竞争力离不开其管理层的领导力。领导力中有几大要素：第一是愿景，它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第二是价值观，百度最近的麻烦也许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但不应唯利是图，漠视道德原则；第三是魅力，阿里巴巴的财务总监表示自己放弃在美国金融行业的高薪随马云创业，正是被领导人的魅力打动，随马云创业的骨干——阿里巴巴集团的十八罗汉大多都是如此；第四是沟通；第五是关心和关注他人；第六是愿意雇用优秀的人（超过自己）。

正如美国的著名管理学家 Peter Drucker 所说，领导力就是把员工的精神境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一个人的责任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才能把一个人的潜力、持续的创新动力开发出来，让他做出他自己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那种成就。